



新时期

文学批评
的
启蒙话语研究

赵黎波/著

XINSHIQUI
WENXUEPIPING DE
QIMENGHUAYU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的时代语境中丧失了自己求应共有的判断能力。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现状还是得标出自己独特的坐标。那一年的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其真其假的解码，三三一在整体意义上经历了“天下皆知之心”之变与转型。第一次转型是“后现代”，现代性“转向了”内心核心的“启蒙共识”。第二次转型是“后现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对“启蒙共识”的解构与消解，同时期内“启蒙共识”、皇朝内外多元倾向，又没得谎言面对当下的复杂多变的现实。这不能不承认较之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现状和未来更让人堪忧。相对于80年代那个批判的狂想曲，

新时期

文学批评

的

启蒙话语研究

赵黎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赵黎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04-7414-2

I. 新… II. 赵… III. 当代文学—文学批评—研
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7131 号

选题策划 王 曜

责任编辑 纪 宏

责任校对 易 凡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的依据、意义和写作思路	(1)
二 历史回顾：启蒙话语与 20 世纪中国	(12)
第一章 启蒙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主流话语的原因	(23)
一 思想解放大潮的影响	(24)
二 80 年代的“新启蒙”思潮的推动	(25)
三 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启蒙价值取向的交相互应	(32)
四 知识分子启蒙主体地位的确立	(34)
第二章 启蒙话语的历史性聚焦	(36)
一 人道主义的论争概述	(36)
二 文学批评中的人道主义话语分析	(45)
三 主体性理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错位	(50)
第三章 启蒙话语的整体特征	(63)
一 对“五四”启蒙资源的策略性借用	(64)
二 启蒙话语对新时期文学的阐释与遮蔽	(71)
三 启蒙话语的现代化迷思	(85)
第四章 “启蒙终结论”再解读	(101)
一 反思“现代性”浪潮中的质疑启蒙之声	(101)
二 后现代理论资源的借用和误读	(112)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

三	“后新时期”、“新世纪”文学的意义指向	(117)
第五章 启蒙话语“合法性”批判的意义误区		
一	——“新左派”思想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解析	(154)
二	“新左派”思想及其对“新启蒙主义”的批判	(154)
三	“重返 80 年代”:从“断裂说”到“抹平论”	(171)
四	由“启蒙”而“表述”:“底层写作”批评的重心挪移	(197)
第六章 困境中的反思与重建		(227)
一	困境与反思	(228)
二	策略与意义	(248)
参考书目		(272)
后记		(283)

绪 论

一 选题的依据、意义和写作思路

人们常用“边缘化”来概括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的命运和处境，但不能不承认较之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现状和未来更让人堪忧。相对于 80 年代那个批评的黄金时代，90 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谓江河日下，“失语”、“缺席”、“迷失”等种种字眼体现出了包括批评者自身在内的人们对批评的失望和不满。一时间，对于文学批评的批评成为批评这个日渐冷寂的领域里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这一类的批评文字大多仅止于一种情绪的宣泄，并未为批评本身的发展提供多少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也有一些文章对文学批评的困境成因有着较为到位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但是囿于其单篇文章的篇幅也是点到即止，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拓展。这类文章还存在着共同的特征，就是涉及具体的批评实践较少，而整体性的泛泛的论述多，由是我称其“不及物”的批评。在对这些批评文字的研读中，我渐渐觉得，这种整体性的“不及物”的批评固然高屋建瓴，气势非凡，但总免不了浅尝辄止的空泛和浮躁。鉴于此，如何选取一个具体的切入点，对“文化大革命”至今近三十年来的文学批评进行一

个总体性的描述，将其历史和现状作以比较，在对其困境的具体分析中寻找应对的策略，就成为本书写作的一个触发点。

在我看来，造成目前批评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批评的价值立场的缺失。所谓“缺席”也好，“不在场”也好，归根结底是文学批评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丧失了自己本应具有的判断能力，无法对文学的现状和走向作出自己的价值评判。那么以价值取向为切入点来对文学批评在当下的危机作以分析，应该是能够切中肯綮的。如果将“文化大革命”后至今近三十年的文学批评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在整体意义上经历了两次价值取向上的转型，第一次转型即是新时期之初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逐渐挣脱“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化价值观，策略性地借鉴“五四”思想资源，形成了以“现代化”价值取向为核心的“启蒙共识”。第二次转型即是在90年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随着思想界出现大规模的“现代性”反思浪潮，文学批评领域对新时期“启蒙话语”的整体性反思。这种反省既标志着批评话语超越新时期的“启蒙共识”，呈现出多元倾向，又使得批评面对当下复杂多变的现实呈现出“阐释的焦虑”和“意义的迷失”。不难看出，文学批评整体价值取向上的这两次转型，都与新时期启蒙思潮的起伏消长相伴生。以“启蒙话语”作为纽带来研究新时期文学批评在价值取向上的变迁，那么当前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危机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清晰展现。所以“启蒙”和“批评”就成为本选题的两个关键词。

本书的书名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在此，首先有必要对书名中包含的研究对象做进一步的界定和说明。90年代以来已有人不断对“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进行质疑，认为它已经不能够涵盖90年代以来文学发生的诸多变化。同时在文学批评中也出现了“后新时期”和“新世纪文学”等

概念^①，但是这样的提法也并没有得到文学界的广泛认可。相反，“新时期文学”在批评中的使用率居高不下。洪子诚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时期文学’是受到多数人认可的、用以概括‘文革’后文学的命名。”^② 笔者在这里借鉴这一说法，将“新时期”定义为“文化大革命”后至今这一时间。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既是产生于这一时期，同时又主要是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为对象的文学批评。这样的框定是为了突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中的启蒙话语与文学创作及时代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确切地界定，本书主要研究的是“文化大革命”至今约三十年来的文学批评。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除了具体的文学批评文本之外，还将涉及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文章。另外，本书中运用较为频繁的 80 年代、90 年代，若没有特别注明，均指 20 世纪的这一年代。）

另外一个关键词即是“启蒙话语”。“启蒙”与晚清以降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的缠绕之紧、纠葛之深，是其他思潮所无法匹敌的，同时对启蒙思潮、启蒙主义、启蒙文学等的研究也始终长盛不衰。由于“启蒙”这一概念本身内涵丰富，外延宽泛，所以，在运用的时候要根据具体的语境对它加以界定和说明，不然，就可能会产生诸多的歧义性和模糊性。这种情况在以“启蒙”为主题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以至于有学者不满地说“启蒙”已成为一个被

^① 丁帆等认为，“新时期文学”是当代文学批评中使用率最高的词语之一，但是 90 年代以来，很多研究者认为，“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已经不能够涵盖 90 年代以来文学发生的诸多变化，从而提出“后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提法，但更多的学者对“新时期文学”的“终结论”不置可否。可参阅洪子诚、孟繁华主编的《当代文学关键词》中有关“新时期文学”的词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0 页。

^② 洪子诚认为，新时期的概念原来是一个暂定的政治概念，后来周扬把它移用在文学中，虽然这一概念的运用只是权宜之计，但“‘新时期’这一原本在社会政治层面提出的概念，在文学领域中得到最广泛的运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时期文学’是受到多数人认可的、用以概括‘文革’后文学的命名。”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滥用的文论术语”^①。本书无意于纠缠“启蒙”本身的理论含义，而是将它作为新时期以来在追求“现代化”这一大的时代语境下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一种话语类型和价值取向，它以知识分子为话语主体，以突破僵化的传统和追求“人的觉醒和解放”为核心内容，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相关的“现代性”命题。当然，新时期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启蒙话语”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历史命题与时代语境相纠葛的产物，新时期之初它在对僵硬的“阶级话语”的批判中获得话语权成为主流话语，90年代又在“现代性”反思浪潮中备受质疑，陷入困境。“启蒙话语”的这种从“时代共识”到“众矢之的”的命运遭际中，裹挟着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命题，同时也是这一命题的集中体现。

目前关于新时期文学批评和启蒙问题的研究都分别有着不菲的成果。尤其是对于启蒙问题的研究，曾一度成为新时期的一个热点。如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姜义华的《理性缺位的启蒙》、许纪霖的《另一种启蒙》、张宝明的《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和《二十世纪：人文思想的全盘反思》、张光芒的《启蒙论》等（以上著作已在参考文献中列出，故不再一一注释，下同），这些都是学界在不同时期对历史上启蒙主义的成败得失的检点与反思。这种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思想史的一种叙述或清理，其中很多命题对新时期的思想文化界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李泽厚对中国历史“救亡压倒启蒙”的论述，就成为新时期学界普遍认同的对“文革”缘起的合理解释，从而为启蒙成为80年代思想界的主流话语提供了理论依据。启蒙问题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和

^① 张光芒：《启蒙：一个滥用的文论术语》，《文艺报》2001年6月5日。

启蒙主义的关系梳理。在启蒙的历史上，也许谁都无法否认它和文学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知识分子自确立启蒙思想的那一天起，文学就成为他们传播新知、启迪民智、改良人生的利器，成为呼唤和推动社会变革进步的精神先锋，因此对启蒙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文学的研究，正如对 20 世纪文学的研究也无法忽视启蒙的影响一样。对 20 世纪启蒙文学思潮也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成果，系统的有韩毓海的《锁链上的花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张清华的《火焰或灰烬——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黄开发的《文学之用：从启蒙到革命》以及张光芒的《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和新近刚出版的《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等，至于文章更是多得不可胜数。以上的研究或是认真梳理 20 世纪文学中的启蒙主义思想，或是着力于反思知识分子的启蒙情结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或是通过文学论述启蒙思潮在中国的起伏消长等，都让我们体会到了 20 世纪文学悲壮的历程，他们鲜明的立场和研究的激情使我看到了文学批评和研究者的忧患意识和启蒙情结，也为我进一步理解启蒙与知识分子及其不同时代命题的纠葛提供了比较翔实的资料。

相对于启蒙问题的研究来说，对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研究相对薄弱，主要著作有程文超的《意义的诱惑——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吴三元、季桂起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概观》，张景超的《滞重的跋涉——新时期文学批评透视》，贺桂梅的《批评的增长与危机》，蓝爱国的《游牧与栖居——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身份》等。这些著作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侧重于批评史式的写作，如《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概观》，《滞重的跋涉——新时期文学批评透视》，这也是目前笔者见到的仅有的两部对新时期文学批评整体描述的著作，基本上采用的是整体概括和具体批评现象、批评家研究相结合的写法，这种史论式的研究

特点是比较全面，缺点是面面俱到，流于描述，难以深入。二是选取一个角度对新时期的文学批评进行研究，如《意义的诱惑——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游牧与栖居——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身份》两部。前者是对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的研究，作为第一部将“文革”后文学批评发展进行整体研究的著作，作者以话语转型为切入点，对西方批评理论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影响及新时期文学批评对这些理论的选择和误读作了细致的解读，许多地方可谓精彩异常。此书应为目前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最具分量的著作之一，遗憾的是因为该书写作于90年代初，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出现的话语转型现象没有能够进入作者的视野中来。这种遗珠之憾只有等后来的研究者弥补了。而《游牧与栖居》意在对文学批评中的中、西文化身份进行辨析，揭示文学批评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和东方化身份。作者显然借助了“后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一些观点，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对当代文学批评的身份表征、价值迁徙和主体阐释焦虑等问题进行追问，新的文化理论为作者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但同时也导致了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偏颇。比如说他对于启蒙话语的认识，认为启蒙就是一种话语霸权，就是启蒙者运用自己掌握的话语体系对启蒙对象进行启发、教育、改造和消灭的思想暴力，所以从本质上说启蒙是一种在二元对立思维之下的一种话语霸权圈套。^①这样的表述无疑受到了福柯权力话语的影

^① 具体的表述如下：“何谓启蒙？启蒙就是运用启蒙者掌握的话语体系对启蒙对象进行启发、教育、改造和消灭的思想暴力，因而，从本质上说，启蒙确立的是一个对/错、优/劣、先进/落后、现代/传统、革命/反革命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是思维和思维对象的分裂，进入启蒙的空间实质上就落入了话语的霸权圈套——谁有资格获得启蒙权力？谁有资格设计启蒙路线？……无论“谁”获得这个“谁”，都意味着对非“谁”的消灭。……启蒙以现代的名义在不断实施其非思想性暴力，力图把他者变为对象化的存在。”见蓝爱国《游牧与栖居——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身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56页。

响，但是结合中国具体的启蒙语境，这样对启蒙话语的指控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它不仅彻底否定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具有共同利益指向和愿望的可能性，而且借助于启蒙话语的失败将启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全盘抹杀。这样的失误提醒我们在对西方理论话语的运用中一定要结合中国具体的现实语境，否则就容易剑走偏锋，得出极端化的结论来。最后一类以贺桂梅的《批评的增长与危机》为代表，着力对 90 年代以来的一些批评现象归纳分析，作者选取 90 年代文学批评的几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一些新走向，涉猎广泛，论述扎实绵密，颇见功力。但偏重于思想方面的整合研究，少具体的文本分析，并没有刻意显示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可能与著者的研究侧重不无关系。

通过对研究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启蒙问题的研究主要偏重于梳理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而少关注其和文学批评的关系。实际上，仅就新时期来说，影响深远的“新启蒙”思潮和文学批评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启蒙研究无论如何也无法忽略的，可以说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阐释、传播“新启蒙”思潮的历史使命，并以此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在 90 年代以来对启蒙话语的解构中，受“后”学理论和“新左派”理论影响的文学批评又成为一个重要阵营，而此时一些启蒙话语的捍卫者也是通过文学批评来回应批判、坚守自己的启蒙立场。相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批评对价值立场的表述总是更为直接和明晰。所以对启蒙问题的研究，如果忽略对文学批评中启蒙话语的研究，显然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完整的。再看上述对文学批评的研究，对于批评的价值取向的研究也不多见，而我以为目前文学批评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批评在价值取向上的危机。对于新时期文学批评价值取向的分析，启蒙话语无疑是重中之重。在

此基础上，本书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从启蒙话语的产生、流变为切入点，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作以整体研究；另一方面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新时期的启蒙话语进行研究，在这样的双向互动中，借助于具体的文本分析，立足于 90 年代前后两个时期批评中启蒙话语的变革，着眼于阐释启蒙话语和文学批评在当前的困境及其成因，目的在于为文学批评当前的价值危机寻求一种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本书的主要思路和内容如下：

第一章：从四个方面探求了启蒙话语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主流话语的成因。笔者认为，首先是思想解放大潮为新时期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选择提供了时代语境；其二，80 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思潮为启蒙话语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也成为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三，知识分子精英地位的确立使得作为一个群体的启蒙话语主体得以形成；最后，文学创作中的启蒙话语和批评中的启蒙话语的交相呼应构筑了新时期之初文学整体意义上的启蒙色彩。

第二章：启蒙话语的历史性聚焦。笔者认为，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无疑是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聚焦点。本书分析了文学批评之所以首先选择人道主义作为启蒙话语的理论和思想资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并对新时期人道主义话语作以具体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许多非人道主义理论借助人道主义得以浮出，成为启蒙的思想资源，这种现象显示出新时期启蒙话语的功利性和人道主义需求的现实迫切性。这种需要既构成了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主体性”理论的强烈的现实意义，同时也造就了它强烈的时代感和话语表述的普遍性之间的错位意识。

第三章：启蒙话语的整体特征。新时期的人道主义话语中包含的是“人的解放和现代化”的命题。“现代化”是新时期

启蒙思潮的核心命题，也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整体特征。它策略性地借用“五四”的启蒙资源，从而接续了被“中断”的现代化历史使命。本章以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的“主题批评”为例，分析了启蒙话语的这种现代性特征，在肯定了这种现代化命题合理性的前提下，指出了这种“现代化”迷失带来的启蒙者思维的偏激，这使得此时的文学批评不仅潜在地规约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丰富内涵，从而为启蒙话语和文学批评在90年代的“合法性”危机埋下了伏笔。

第四章：“启蒙终结论”再解读。“启蒙话语”在90年代重新遭遇困境，后现代批评的“启蒙终结论”即是这种困境的主要表征之一。在大规模的“反思现代性”浪潮中，启蒙作为一个与“现代性”相关的命题得到质疑。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左派”成为反思启蒙话语最为强劲的三种文化思潮，这标志着新时期文学批评启蒙立场的分化。本章论述了后现代主义批评对8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启蒙话语的解构。后现代主义批评借助西方理论资源，宣布了“新时期”启蒙话语的“现代性”命题的终结，并构筑了“后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等概念，本章批判性地解读了后现代主义批评对西方理论资源的误读和对90年代以来中国现实文化阐释的片面性，重申了启蒙话语的合理性和意义。同时指出，后现代批评的这种解构启蒙话语和对消费文化的认同，使得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出现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9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些“个人化”、“消费化”、“市场化”特征的出现。

第五章：启蒙话语“合法性”批判的意义误区。对启蒙话语的“合法性”质疑是启蒙困境的另一个主要表征。本章主要分析“新左派”思潮影响下的文学批评对80年代启蒙话语的解

构。“新左派”思潮是在 20 世纪末同自由主义的论争中浮出水面的，本章简略介绍它的一些思想背景和主要观点后，重点解析了它对 80 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批判。同时批判性解读了一些受到“新左派”思想影响的文学批评对 80 年代的文学批评中的启蒙话语的解构。部分“重返 80 年代”的文学批评认为 80 年代的文学批评中的启蒙话语构成了对其他话语的压抑，并以这种压抑确立了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本节分析了这些批评背后的理论资源和它的一些具体指向，认为这些批评存在着从方法论走向价值论的思想误区，其实是在批判 80 年代启蒙批评的“断裂论”后又走向了一种“抹平论”。这使得它们在揭示出 80 年代启蒙话语的压抑机制的同时，也否定了 80 年代启蒙话语的合理性和历史意义，从而导致了另一种“盲视”和“偏见”。另外，本章还以当前的“底层写作”批评为例，论述了在“新左派”思潮及其他底层研究理论的影响下，一些批评者如何将“底层写作”批评的重点从 80 年代的“启蒙”转移到如今的“如何表述”的层面上，并指出这种倾向潜在地解构了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启蒙倾向，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启蒙民众的合法性地位，同时文学批评的这种倾向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致使目前的“底层写作”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第六章：当前文学批评中的启蒙话语如何可能。上述从不同方面的解构使得文学批评中启蒙话语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本章第一节进一步指出，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这种危机不仅与知识分子目前启蒙身份的丧失有关，文学及文学批评在当前的边缘性处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而文学批评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启蒙话语丧失后出现的价值取向上的危机。笔者认为，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是 90 年代启蒙的主要问题，也是文学批评走出价值危机的一种选择。

从“反启蒙”的话语中汲取启蒙的教训，避免精英心态，将自我启蒙与启蒙大众结合起来，并重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才能更好地超越启蒙的困境。在第二节中，结合具体的批评，对90年代以来坚守启蒙话语的一些文学批评作以分析，指出在目前的这种反启蒙语境中，这种坚守具有一种姿态性的意义，但也正是这种姿态性使他们在对启蒙话语的坚持中出现了一些高调性的偏激。文学批评中启蒙话语的这种偏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启蒙思想资源的薄弱。种种情况都说明，在目前的语境中，启蒙是一项未完成但又遭遇重重困难的命题，所以在确立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之后，文学批评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针对中国目前的现实，在反思启蒙话语的同时，寻找捍卫和坚持启蒙的思想资源。

启蒙问题是一个理论色彩很强而且覆盖面极广的命题，新时期文学批评同样如此，所以对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的启蒙话语研究这个选题本身对于笔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如何从种种纷纭复杂的现象中把握新时期文学批评流动的脉搏、感知它多彩的旋律，是我在选定新时期文学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后长时间思考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后至今的文学批评已走过近三十年的历程，三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在这三十年中，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变化用翻天覆地一词来形容应该不为夸张。其最为明显的特点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在这几十年间中它自身前后的差异性。虽然，不断的反思和否定是一种后来居上的进步景观，但是在这种反思中文学批评的立场和取向变化的幅度之大和转变之迅猛还是让人在眼花缭乱中不乏震惊和困惑。所以以价值取向为切入点来把握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这种转型，就是本书选题和写作的初衷。但是，本书采取的这种对照式写作和专题式分析在呈现出一些问题的同时，也难免会忽略和遗漏一些现象，敬请方家不吝

指教。

二 历史回顾：启蒙话语与 20 世纪中国

在正文开始之前，对启蒙话语在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流变加以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启蒙话语何以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

“启蒙”，西文为“enlighten”，本义为以光芒把事物照亮，引申为使蒙昧者变得有知识、教养和理性。以此为词根而有“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一词。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启蒙”是指 18 世纪欧洲以反对传统社会、宗教和政治观念为标志，崇尚理性主义的哲学运动。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将理性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和准则，反对一切权威，尤其是中世纪以来的基督神学在精神领域内的极权统治，力图将人类从恐惧、迷信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启蒙运动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为现代民主政体和生活制度作了必要导引。启蒙和现代性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所谓现代性就是“欧洲启蒙学者有关未来社会的一套理性设计”^①。所以，我们可以把近代以来西方的现代化运动看做是启蒙精神的社会实践成果，启蒙思想的核心——理性，也被抽象为现代性的基本要素。

清末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也被认为是一个不断反抗蒙昧与专制、追求现代化的启蒙历程。但与西方启蒙运动产生于对自身思想文化的反叛不同，启蒙运动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内涵。20 世纪的中国语境中启蒙问题远远超出了西方启蒙主义命题的内涵，我们不能仅仅在认识论上谈论启蒙的问题，而要从它

^① 赵一凡：《现代性》，《外国文学》2003 年第 2 期，第 54 页。